

■历史民族研究

解析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移居之谜

——西安事变纵横考之十

刘东社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兵谏扣蒋后,出于对杨虎城部队的不大放心,中共中央两次致电提醒和督促张学良应将蒋氏牢靠掌握在自己手中,此乃张学良坚请蒋氏移居的真正原因。为此,张采用了多种方法,却均遭蒋氏坚拒。随之,张以伪装“悔祸”和假意答允尽快送蒋回京的办法,达到了让蒋移居的目的。蒋态度由硬到软的转变,亦以同意移居为开端。蒋氏的态度转变和张学良为引导事变走向而施展的“骗”蒋移居小谋略,都应视为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新城大楼;高公馆;移居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7)03-0036-06

PDF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3.009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the Mystery of Chiang Kai-shek's Migration in Xi'an Incident

LIU Dong-she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After Chiang Kai-shek had been held under arres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sent a telegram twice to remind Zhang Xueliang that Chiang Kai-shek must be firmly supervised in his hands. This wa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Zhang's request for Chiang Kai-shek's migration. Though Zhang adopted a variety methods, Chiang Kai-shek had resolutely refused. Subsequently, Zhang disguised regret and false promise to send Chiang Kai-shek back to Nanjing. Chiang Kai-shek then consented to migrate. In fact, his attitude changed from hard to soften means the beginning transition of the peace coexistence. Chiang's attitude changed and Zhang's small strategy of cheat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contribution of many factors to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incident.

Key words: Xi'an Incident; Zhang Xueliang; Xincheng Mansion; Gao Guizi's Residence; Migration

西安事变曾被人形象地称之为“犹如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1]392}参与跳跃的各方在短短数月间亦联合演出了一幕幕曲折生动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活剧。其中,有关宁陕和谈、周蒋会面、释蒋回宁及张氏陪送等内幕情节,往往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相对而言,蒋介石在幽禁中的思想波动、心理变化及其行为举止等,则研究

成果较少。尤其是蒋最初被拘于新城大楼后移居至高桂滋公馆一事,迄今尚无人问津。为何张学良千方百计要让蒋移居?其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蒋为何开始坚拒却最终顺从?张学良与端纳在其中各起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些疑问,本文将利用相关资料进行深入解析,并从中透视事变各方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关系。

一、蒋介石在新城的三昼两夜

1936年12月12日晨8时左右,东北军搜山部队找到蒋介石后,即由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与第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等,同车将蒋介石“请”至西安,羁押于新城大楼东厢房。事变期间,蒋在此共住了三昼两夜,其主要活动:一是屡次与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人会谈;二是以绝食、拒穿寒衣等姿态做出倔强、死硬的模样,展示其所谓“人格”、“正气”;三是开始坚拒后则同意由新城大楼移居至高桂滋公馆。

此际,张学良见蒋次数最多,杨、邵见蒋各有两次。张学良或与蒋激烈争辩,或和缓恳求,总希望蒋能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各派力量以坚决抗日。杨虎城则很平静地向蒋说明了事变的主因和他们发动事变的动机,只是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希望蒋为国家计,应认真考虑西安方面所提的八项主张。邵力子亦曾婉劝蒋稍息怒气,使张学良能得尽所言,并认为蒋之主张也决非全无可采之处。但这一切,均遭蒋的拒绝与呵斥。蒋并反复表示:自己“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2]188}

关于蒋态度极其倔强顽固的资料甚多,如李维城回忆说:“张、杨先后见蒋,蒋故作镇静,板起面孔,不置答理,并责问张说:‘你是不是我的部下?’杨复以狐裘进,亦拒而不纳,甚至屏绝饮食,故示倔强。”^{[2]173}邵力子回忆,张学良当面对他说,蒋初押在新城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2]188}孙铭九回忆,12日上午张、蒋首次见面交谈时,两人竟“争吵起来,声音很高”。^{[2]223}同时在西安被扣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百里)事后承认,蒋“当时态度的确很强硬”。^{[3]253}《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也曾转引端纳的话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

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语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直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4]227}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蒋态度死硬、冥顽不化却也是事实。对此,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处处炫耀自己如何临危不惧,保持“人格与正气”,俨然一付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模样。而大陆刊行之回忆资料和后人著述,则多称蒋之表

现实为色厉内荏,装腔作势。倒是蒋百里分析蒋氏之心态或许接近真实,即“大概当他被捉之时,情知必死,所以不怕死”。^{[3]253}不管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但昔日声势烜赫的蒋委员长成为阶下囚之初,其表现确实令南京方面感到“还像个样子”。

很显然,张、杨兵谏计划的第一步——扣蒋,固然获得了成功,但自蒋介石入城后,最初两三天内,如何劝说蒋氏改变态度和改弦更张,却成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正由于蒋的态度恶劣,使张、杨一时对这囊中之物,竟有如刺猬在怀、无从下手之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张、杨扣蒋并不算难,但要让蒋某人改变其政治主张和既定国策,反倒成了兵谏大局中最为重要却又是极伤脑筋的一件事。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之态度也逐渐有所变化。在新城时,蒋对张、杨的主张、要求根本就拒绝讨论。12月14日黄昏移居至高公馆后,《西安半月记》则首次将张、杨的八项主张一一罗列了出来,蒋、张并就此有所讨论且发生争执。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逆”,随之派飞机对西安外围三原、富平、渭南、华县等地进行轰炸。16日晚和次日上午,张学良两次邀约蒋百里共同见蒋,劝说蒋书写了拘禁期间的第一道手谕,令何应钦三日内停止轰炸并暂停军事进攻。随后,蒋鼎文携此手令经洛阳飞往南京,陕西东部的军事冲突暂告中止。18日,刚到西安不久的周恩来即电告中共中央:“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5]220}可见,蒋氏态度由强硬转向逐渐软化,当以同意移居为其开端。

二、请蒋移居两个细节之辨正

关于让蒋移居之事,王菊人在60年代前期所写回忆材料(即后来修改刊行的《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称:“叫蒋移居是杨向张提出的。杨对张说:‘蒋将来总是要放的。听监视的军官报告蒋吃饮睡觉都不好。新城一早、一午到处吹号,很不安静。我这里厨子,不会做南方饭,你那里厨子高。培五(高桂滋字)的公馆是新修的洋房。那一带安静,叫蒋住在那里好不好?’张赞同了。所以才叫蒋搬家的”。此种说法,至今仍有论者在沿用。^{[6]105}

然而,对于王菊人所写的回忆材料,当年高崇民即指出,他与赵寿山、南汉宸、申伯纯等均感到,王“对于整个事变的写法和内容的转移,似有基于个人关系和感情之嫌”。“同时把西安整个事变,写成以

杨将军为中心。这种转移内容的写法,既与事实不符,恐非增重杨将军之道”。^{[7]709}以后王菊人接受批评,对初稿进行删减修改,正式刊行时即删掉了此段。很显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杨虎城自然不会主动提议让蒋移居,同时亦无史料可以为王氏的说法提供佐证。杨瀚先生以王氏已经删除的文字和放弃的说法为依据,来证明杨虎城提议让蒋移居,同样恐非增重其先祖之道!

另外,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在12月12日记载:“当日上午他与张学良激烈争辩之后,张‘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8]224}此一记载亦绝非事实!因为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均无12日上午张请蒋移居之事;更因为张学良不可能在刚刚下令将蒋押送至新城一两个小时后,就立刻会改变最初的安排,而以不安全为由请蒋移居!根据其他人的回忆,大致可以判断,张当面要求蒋移居且遭后者拒绝之事,应当发生在12月13日上午而非12日上午。

要之,杨虎城绝不是最早主动提出让蒋移居之人,张学良首次当面请蒋移居的时间,应在12月13日上午而非12日上午。

三、张学良为何一再坚请蒋氏移居?

据蒋氏《西安半月记》的记载和看护蒋的宋文梅等人回忆,12月13日清晨6时,张学良早早就来见蒋,因蒋方睡未起,张即未曾惊动。8时后,张复来,两人交谈中“仍在争论,没有什么结果”。^{[2]254}如上文所述,张应在此次交谈时提出让蒋移居,遭蒋拒绝。约在上午11时,张学良转请邵力子“劝蒋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因高宅在张寓金家巷内,便于张随时见蒋,又有御寒设备,草地宽旷,卫生条件较好”。^{[2]188}蒋之《西安半月记》也称:“十一时,力子又来见。”邵言:“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住。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谒。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邵氏的婉劝,同样遭到蒋的严词拒绝。

13日黄昏时,张学良再去见蒋,“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2]255}当晚,张学良还让一〇五师师长刘多

荃去请蒋移居至高公馆,蒋依旧拒绝。晚11时后,张命令孙铭九也前往新城大楼,“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孙铭九到新城后,先由负责看管蒋的宋文梅转告蒋氏,蒋仍“不愿迁出”。宋回忆称:“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刘、宋、孙用尽各种办法,直闹腾到凌晨1时许,蒋就是坚决不动。孙等无法,只好回去复命,一切等明天再说。

14日早晨,张学良来见蒋,却立于门后,两人彼此相对,半晌无言。嗣后,蒋要求再见邵力子,并“再四催询”,但张学良却未满足他这一要求,以至蒋竟怀疑邵“已遭不测”。正午时,张学良再来,还是请蒋移居,蒋仍拒绝。交谈中,张突然拿出端纳来电示蒋,谓端纳即将来西安。蒋曰:“端纳到时,可嘱来相见”,并称“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

那么,张学良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千方百计要让蒋介石移居到高桂滋公馆居住?蒋氏《西安半月记》曾记曰:“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8]229}此一猜测,蒋氏显然高估了自己对杨虎城的影响力,故可置而不论。

综括张让蒋移居的理由或缘故主要有:(1)蒋在绥署起居不便,新城大楼早午吹号,不很安静,影响蒋氏饮食睡眠,而高公馆新近落成,前有草地,清净整洁,且有御寒设备。(2)蒋居新城有很多不便,移居后亦便于张学良朝夕趋谒。(3)蒋居绥署不甚安全。然而,这三点恐怕都不是让蒋移居的真正原因。

首先,蒋在绥署生活起居不便,这或许是事实,但绝非移居的主要原因。早在1934年10月中旬视察西北时,蒋氏夫妇于10月12—17日和10月20—22日均曾下榻于新城大楼。可以设想,两年蒋氏夫妇都能安然接受新城的居住条件,何以两年后作为阶下囚的蒋介石就无法忍受而必须移居?

其次,新城大楼离张学良公馆有一段距离,张氏早晚谒见蒋确有某些不便之处,但也并非就无法克服而必须让蒋移居。试观张学良在蒋氏移居之前,均曾每日数次见蒋,可见第二点理由亦不是很充分。

最后,关押蒋的新城东厢房有前后两间,中间有过道相连,蒋住于北侧一间,南侧即为警卫室。预先,杨虎城对看守蒋的警备安全问题做了周密部署,

新城大楼安排有两道守卫部队，外侧的第一道为西安绥靖公署的特务营，内侧的第二道乃杨虎城的卫士队。卫士队除以一个队守护新城内西边杨虎城住宅（即事变时张、杨联合指挥部所在）外，另以一个队专门负责看护蒋介石，在蒋住屋的室内、房顶、门口台阶下边四周等，共安排了三层卫士警备。为防止蒋介石自杀或出现别的意外，提前就把室内的电灯、电线全部取掉了。日常看管和饮食起居照料等具体事务，则由特务营长宋文梅与杨虎城的几个亲信副官负责。这样的严密部署和层层设防，恐怕任何外部的人员和武力都很难对蒋的安全构成威胁。

唯一令人担心的，倒是来自于内部的某些不稳定因素。蒋刚到西安后，12月12日深夜，十七路军参谋长李兴中便收到了让其救蒋建立“千载一时之功”的匿名信。^{[9]346}14日，孔祥熙曾令樊崧甫与孙蔚如“密加联络”，^{[10]138}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也曾设法拉拢王宗山，^{[2]558}冯钦哉还献计南京让陈子坚赴西安活动，设法劝杨虎城反张并送蒋至三原再转大荔，另让杨渠统携百万元现款去西安，以金钱收买之法来分化瓦解十七路军。^{[2]176}12月14日，毛泽东就曾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称：“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5]199}可见，张学良所说的蒋“在此不甚安全”，未必就一定单指蒋氏人身的“不甚安全”，恐怕亦暗含着对能否完全控制蒋氏的隐忧在内。而这种隐忧，应该才是让蒋移居的真正原因所在。

由于12月11日深夜后，张、杨即在新城大楼设立联合指挥部，二人并肩坐镇，联合指挥兵谏行动。捉到蒋介石后，张、杨很自然地就命令把蒋介石押送至西安绥署交给杨虎城部队看管，这大约是张、杨最初惯性思维的结果。可在12日晚9时，中共中央即致电张学良：“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11]802}这里的“其他部队”语义含糊，既可指张氏卫队营以外的其他东北军部队，也可理解为东北军以外的其他部队，即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接电后，次日即命副官长谭海与高公馆管事贺善培协商让蒋借住高公馆之事，贺当即应允。^{[12]264}也是从13日上午起，张学良开始屡次要求蒋氏移居。很显然，张学良对中共的提醒或建议是非常认同的。13日午后，毛泽东等再次致电提醒张学良：“监视蒋介石等之人员地点武装宜有绝对保证，此当

关系全局。吾兄精明过人，必有周密布置。但恐执行者有偶然之疏，则将遗无穷之祸。如何使万无一失，祈高明时察及之是祷”。^{[13]326}在此电的提醒和督促下，当天黄昏，张学良即再次请蒋移居。遭拒绝后，当晚，张命令刘多荃、孙铭九等人，蒋“必须迁移”，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请他搬到”张身边来。为此，孙铭九等人几乎要动粗强行让蒋移居。

所有事实均可印证，正是中共的提醒、建议以及张学良对此的认同，才导致了蒋氏的移居。而让蒋移居的本质缘由，是对杨虎城部队看押蒋氏的不大放心与不太信任。考虑到事变爆发前张、杨与中共关系的差异，即张、共关系更为密切而杨、共关系稍差的事实，考虑到事变初期南京“拉杨打张”的种种图谋，中共与张学良有所担忧而必须将蒋介石牢牢掌控在张氏手中的心情，其实亦不难理解。

四、骗蒋移居——张学良“悔祸”说新解

自12月13日起，张学良使尽了浑身解数让蒋移居，诸如自己出面请求，委托邵力子婉劝，让部下请求甚至迹近于胁迫，均未能奏效。蒋拒绝的理由是，“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惟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亦不迁移。^{[8]226}13日晚，刘多荃、孙铭九、宋文梅等让蒋移居时，蒋撒泼耍赖就是不动。对此，大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均谓蒋氏疑惧张、杨会像国民党处决政治犯那样将自己深夜秘密处死。其实，此说多少近于臆测。蒋氏怕死的成分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非他拒绝迁移的主要原因。盖蒋氏已为张、杨囊中之物，若张、杨真要处死蒋氏，任凭他如何撒泼也难逃一死。对自己的这种处境，蒋不会不明白，那么撒泼耍赖又有何用？

说到底，在事变初期，蒋之所以态度顽固死硬且坚决拒绝移居，很大程度上带有与张、杨进行心理和意志较量的成分在内，即蒋还幻想着万一能迫使张、杨退让或“悔祸”改正，自己或许就有获释的可能。只有当蒋真正弄清了张、杨为求救国救民而不惧牺牲的坚决立场和坚韧意志后，蒋氏的立场态度才可能真正有所转变。

至14日午后，让蒋移居的所有努力似乎均告失败。当天下午，受宋美龄委托，蒋氏夫妇的私人顾问端纳和黄仁霖飞抵西安。端纳通过张、杨及其他军官了解了西安方面的诉求，对事变的真相有了较为

清晰的印象。随后,张学良即带着端纳前去见蒋。

据说,经过端纳劝说,蒋方信张、杨对己并无恶意,随即同意移居。当日黄昏后,蒋即移居于张公馆紧北边的高桂滋公馆。可是,此事还是留下了一丝令人深感困惑之处。邵力子就说过:“关于蒋移居的事,我心中有些疑怪,为什么张本人坚请,我又代张力劝,蒋都坚决拒绝,只隔了一天而蒋即听端纳的话接受移居呢?”^{[2]189}确实,在别人三番五次都无法劝动蒋氏的情况下,端纳究竟有何魔力,能够稍加劝说就会令蒋同意移居?对此,笔者反复考究,终于有了新的判断,现试作诠释如下。

首先,对于促成蒋氏移居一事,不能说端纳的劝说毫无作用,但其作用终究有限。而真正起作用者,应该还是张学良本人。

其次,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记载:张学良自称他13日读了蒋的日记和重要文件,14日晨即泪流满面而来,“若甚愧悔者”,半晌无语,自行退去。正午再来,张“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居高宅。’”遭蒋拒绝后,张竟流泪称自己“无人格”,承认此次行动“轻率卤莽”,“深觉自己观察错误”,现在“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绝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蒋称自己“仍力拒其请”,并告诉张:“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则说:“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此即所谓张学良读蒋日记后的“悔祸”之说。以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亦有类似说法。其余如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所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和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等,也都认为张在事变初“实有愧悔”并欲保护蒋公脱险云云。

由于《西安半月记》系陈布雷奉蒋命加工所为,大陆学者一向对其记述颇不认可。可台湾“国史馆”所存蒋氏《困勉记》同一天日记亦称:“端纳、黄仁霖入见,端纳谓张学良已悔悟,恐公居新城为杨虎城操纵,急求公迁居。张学良亦来,谓‘迁居后一切事皆服从委员长意旨,并早送委员长回京’。公乃许之。”^{[13]340}可见,蒋之同意移居,正缘于张学良的“悔祸”及答允送蒋回京。因此,所谓张氏“悔祸”的表现,恐怕未必完全属于编造。

再次,对张学良“悔祸”说,杨奎松先生曾详举大量证据,以证明张学良在事变期间不曾有过任何退缩的表示,并无任何明显的动摇和后悔之意。^{[13]341-347}此点笔者深表赞同,张在事变期间的立场、态度始终如一,确实并无所谓“悔祸”之意。

最后,既然张学良根本就未曾“悔祸”,而有关其“悔祸”的记载似乎又不宜轻率否定,如此矛盾现象何以索解?笔者以为,张氏的“悔祸”与答应送蒋回京,纯属一种伪装或表演,其真正意图在于诱骗蒋相信移居后即可很快获释,从而达到让蒋移居的目的。此一推断的理由有三:

(1)张明显做出“悔祸”姿态的时间,实在说来主要集中在14日当天。此前固无,此后仅在15日夜,蒋称张告诉自己“实后悔莫及”,蒋云:“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联想到13日从早到晚,张学良使尽各种办法,也未能让蒋同意移居,其内心的焦虑当可想而知。为尽快让蒋移居,14日一大早起,张就以流泪、无言自去等神态与语言相配合,表演出“悔祸”的一幕骗剧。

(2)按《西安半月记》所记,14日正午蒋、张的一番对话,张虽表示“悔祸”,但言辞的重心始终围绕着“移居”二字展开。当日黄昏,端纳劝蒋迁居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只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可见,在张氏“悔祸”的背后,始终凸显着移居的真正动机。

(3)移居甫毕,蒋问张:“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结果,张之态度立变,声称“此事颇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议必难通过”。蒋痛斥张“食言无信”,“尔何无耻无信一至于此!”张则反讥蒋“太专制”、“思想实太右太旧”、“赶不上时代”,并一度不愿让黄仁霖见蒋。此后,张即恢复常态,一再要求蒋接受八项主张,在蒋与南京方面未接受前,“学良现无释蒋意,只保证安全”。^{[8]283}蒋氏移居甫毕,张即“食言背约”。仅此一点,即可反证,此前张之“悔祸”,实为演戏耳。

蒋介石曾批评过张学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无论此评语是对是错,但世人都公认张学良确实聪颖过人。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也确曾在不少军政问题和细节小事上要弄过一些聪明且带狡黠意味的

小手腕或小计谋。以伪装“悔祸”和答应尽快送蒋回京的办法,“骗”得蒋的应允移居,大约也只是张氏在政治大事变中的小谋略之一吧!而张学良为寻求让蒋移居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折射出了作为领导者引导事变走向时所付出的艰辛与费尽的苦心。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无疑是或大或小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蒋氏态度的转变和张学良骗蒋移居的小谋略,自然都应被视为众多的因素之一。

[注 释]

- ① 一般回忆临潼搜山找到蒋氏约在 8 时许,张、杨即令人送蒋至新城大楼。蒋之《西安半月记》亦称:送蒋的汽车行至西安东关,张还派人来传令送蒋去新城。而 12 日上午张、蒋首次见面交谈,约在 9 时半以后,此时离张下送蒋至新城的命令才过去了不到两个小时。
- ② 《西安半月记》多有不实之词,此即一例。张既然连蒋都敢于“劫持”,让蒋移居这等小事,张岂会因蒋盛怒而“不敢进言”?就情理言,张如欲让蒋移居,当然是自己先当面提出,只有在遭蒋拒绝后才会请羁押中的邵力子出面婉劝,而绝不会一开始就请邵去“转劝”。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 斯诺文集(第 2 卷)红星照耀中国[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 吴福章. 西安事变亲历记[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3] 陈公博. 苦笑录[M].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4] 傅虹霖.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5]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6] 杨瀚.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7] 编委会. 高崇民诗文选集[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9]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 丹心素裹[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0] 刘东社. 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M].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

[11] 张友坤,钱进,李学群. 张学良年谱(修订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2] 姬乃军,石八民. 西安事变旧址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13] 杨奎松.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李兆平]

(上接第 35 页)

[8] Nahmias S. Fuzzy Variables[J]. Fuzzy Sets and Systems,1978,1: 97—101.

[9] Cooman G de, Kerre E E and Vanmassenhove F. Possibility Theory: an Integral Theoretic Approach [J]. Fuzzy Sets and Systems,1992,46:287—299.

[10] Liu B D. Toward Fuzzy Optimization without Mathematical Ambiguity[J]. Fuzzy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2002,1:43—63.

[11] Liu B, Liu Y K. Expected Value of Fuzzy Variable and Fuzzy Expected Value Models[J].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2002,10: 445—450.

[12] Liu B. Uncertai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xiomatic Foundations [M]. Berlin: Springer-Verlag,2004.

[13] Klir G J. On Fuzzy-set Interpretation of Possibility Theory [J]. Fuzzy Sets and Systems,1999,108:263—273.

[14] Wang Z, Klir J. Fuzzy Measure Theory[M]. New York: Plenum Press,1992.

[学术编辑 赵大洲]

[责任编辑 朱毅然]